

〔韩国〕赵润济 著

韩国文学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韩国文学史

〔韩国〕赵润济 著
张璉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FF68/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文学史/ (韩) 赵润济著; 张珽瑰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5

ISBN 7-80050-963-X

I. 韩… II. ①赵… ②张… III. 韩国-文学史 N. I312.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777 号

韩国文学史



著 者: [韩] 赵润济

译 者: 张珽瑰

责任编辑: 程晓燕

封面设计: 孙元明

责任校对: 张景秋 张树梅 陈海力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 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20.375

字 数: 473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544 号

ISBN 7-80050-963-X/I·103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韩国大山财团支援刊行

趙 潤 濟

韓國文學史

探求堂 1992年

本书根据韩国探求堂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98 - 0544 号

译者前言

近来译者译了两本关于朝鲜文学史方面的书，一本是金台俊先生著《朝鲜汉文学史》，另一本就是赵润济先生的这本《韩国文学史》。前者偏重于研究梳理朝鲜汉文文学发展历程，后者研究重点则放在韩国国文文学方面。这两本书各自侧重于该国文学史的一个领域、一个侧面，合起来就是朝鲜文学史的全貌。因此，无论是从其内容上来说，还是从它们在韩国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来说，这两部学术著作都堪称朝鲜文学史书之双璧。

朝鲜文学史分为汉文文学史和国文文学史两大部分，此乃朝鲜文学之特色，也是民族和国家历史经历之纪录。

我们知道，朝鲜半岛作为我国近邻，很早以前就同我国有了多方面交流。远古时期的部族迁移不说，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这种交往就史不绝书。据中朝两国典籍记载，公元前11世纪殷末周初，殷商贵族箕子率众五千东走朝鲜建国，武王封之为侯，箕氏朝鲜每12年朝周一次。春秋时齐国与朝鲜有大量贸易往来，朝鲜的文皮（虎豹皮）在中原各国享有盛名。燕国与古朝鲜以陆路之便既有争战，又有贸易，是时，中国的金属器具自燕传入朝鲜。秦统一中国时，许多中国人为避乱逃入朝鲜，进入半岛中南部的中国人甚至建立起国家。据《后汉书》记载：“辰

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故或名之为秦韩。”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反，汉军平叛时，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颠覆箕氏自立，史称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其故地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半岛南部则有辰韩、马韩、弁韩三部。汉四郡设立使中国同三韩贸易空前活跃，中国的丝绸、铁器、铜器及三韩的人参、毛皮是热门商品。当时贸易有陆海两途，陆路贸易即在汉四郡进行，海路贸易多在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中南部沿海进行。后来中国商人又经朝鲜半岛把贸易延伸到日本。

政治、经济交流必伴以文化交流。其中，除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交流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及金属器具、丝绸、漆器等蕴含的文化内容以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汉字传入朝鲜。

中外学界一般把中国汉字传入朝鲜的时间定为我国战国至汉初这段时间。但我想，这应是指汉字在半岛南部三韩地区的传播普及。至于北部，一是由于地缘交通之便，二是大量人群迁徙，其使用汉字汉文可能要早得多。例如，箕子就有汉文作品传世：他受封于朝鲜后朝周过殷墟，伤感至极，作《麦秀歌》，被收录于《史记》中。公元前200年左右，卫氏朝鲜有一名叫霍里子高的大同江艄公作四言汉文诗《箜篌引》（一说是其妻丽玉作）。从霍里子高其名看，显然不是移居的华夏人。这表明当时有文化的朝鲜土著人士已掌握汉字汉文了。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我辽东建国，后遂步南迁，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从此以后成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由于这一特殊经历，高句丽使用汉字汉文更为普遍。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于公元前17年用汉文作《黄鸟歌》。现仍保存在集安的《好太王碑》是高句丽长寿王为颂扬乃父拓土伟绩而于公元414年刻立，其碑

文使用的是汉文隶书，足证高句丽使用汉文汉字与华夏同步。长寿王迁都平壤后无疑是继续使用汉文汉字的。

在半岛中南部三韩地区，很早就有中国人迁入，秦时达到高潮。汉四郡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汉字传播，但由于朝鲜自己的史料已湮没无存，因地缘关系中国史籍中保存的三韩史料也很少，故当时汉文汉字在三韩传播使用情况已很难了解。但伽倻国（存世于公元1~4世纪，位于洛东江流域）的一首汉文诗《龟旨歌》向我们透露了汉字在那里普及情况。4世纪以后儒、道、佛在百济、新罗广泛传播，保存下来的文献较前增多，可知当时早已用纯熟的汉字汉文修史和创作诗歌了。

汉字以及由汉字作载体的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是一个漫长和渐进过程，它循着先汉字、次汉文、再汉籍这样一个顺序，不断深入扩展，而且总是由社会上层先行接受掌握然后普及民间。所以，为汉字和汉文化之东传划定一个起止年代，只不过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粗略的描述而已。

据研究，在汉字传入朝鲜之前那里是没有文字的。因此，汉字传入后很快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汉字所载负的汉文化也被悉数移植吸收，从而使朝鲜半岛成为“汉文化圈”重要组成部分。7世纪中叶，建都于庆州的新罗联合唐朝军队先后灭亡高句丽和百济，统一半岛，但从此新罗奉唐正朔，朝鲜半岛在政治上正式纳入天朝礼治体系，或叫华夷朝贡体系。从此以后，中国上自典章制度、科举文化，下至农工百艺、宗教礼俗均成为朝鲜历代王朝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事大慕华”成为士大夫阶级的主流思想。当时朝鲜的士子同中国的儒生一样，读圣贤书籍、作庙堂文章是他们每日的功课。

10世纪初高丽王朝建立以后，为了抑制地方豪族势力，高

丽光宗重用中国后周人双冀，于958年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用考官制度取代原先的骨品门阀制度，从此高丽的选官制度同中国统一起来。这样，丽、鲜两朝有许多朝鲜人到中国应试作官，这些人后来大都重返故土，随之也把中国最新的文化发展带了回去，推动了朝鲜汉文文学的发展。

但一般来说，朝鲜的汉文文学发展较之中国总是迟延一个时代。如，中国盛唐诗歌创作进入高潮时，同时期的新罗仍在流行中国六朝时期的骈骊文，高丽时期盛行唐风诗歌时，中国已兴起宋词元曲了。因此，18世纪朝鲜著名学者李德懋说：“东国文教较之中国大抵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者，即中国衰晚之始厌者。”

但这是从文学样式发展整体而言，在应用时文方面两国是同步的。随着宗藩关系的加强，两国使节来往日益频繁。因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稳定和睦之中，故使节之使命大多是贺节、册封之类例行礼仪，并没有多少实际内容。这样，双方都有意地把文化交流、以文会友视为使节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此双方都选择能文能诗者充当此任。于是，官场上的奏封颂策、私交中的应酬唱和便十分活跃而富文采，产生了《燕行录》、《皇华集》一类名著名篇。

总之，在朝鲜被纳入汉文化圈以后的两千年间，那里的朝野文人均操汉字、习汉籍、作汉文，创作出许许多多优秀汉文作品，构成了朝鲜古代文学的主要内容。我们所说的朝鲜汉文文学，就是指这些朝鲜人用文言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虽然以汉文写成，但表达的却是朝鲜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因此有别于中国的汉文作品。总结和研究这些作品，便是朝鲜汉文文学史的使命。

中国和朝鲜虽然通用汉文汉字，但两国语言并不相同，这给朝鲜人民造成一个巨大困难：由于语言和文字不统一，人们不能用文字直接记录语言，不仅生活不便，而且造成大量民间口头文学失记失传，这是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于是，新罗统一半岛以后，著名学者强首、薛聪总结前人成果，发明了“吏读”文字，即假借汉字音义标记朝鲜语。这种文字转换复杂，在使用上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后来未能流传。但它总算是一种可以用来记录话语甚至进行文学创作的工具。三国时代的一些口头文学便依靠它记录保存下来；统一新罗时期用这种文字创作的诗歌传至后世，称作“新罗乡歌”，成为朝鲜国文文学的最初一批作品。因此，吏读文字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高丽时代提倡儒学，鼓励汉文，但国文文学还是有较大发展。当时民间流传大量国语民歌，史称“高丽歌谣”。由于这些民间作品大都是口传，故大部遗失，仅有一部分或被译成汉文，或被后人据口传用新发明的谚文录下，我们今日才得以与之谋面。与此同时，高丽文人也用吏读文字创作出许多国语诗歌，并逐步形成固定格式，遂产生了类似我国词的翰林别曲、时调等诗歌门类，这标志着朝鲜的国文文学步入形成期。

朝鲜朝建立以后，第四代王世宗有感于语文不一的矛盾，令人参照中国的音韵学创制新文字，终于在1444年颁布拼音文字“训民正音”。这种由28个字母组成的文字可以准确地记录朝鲜语，而且简单易学，给没有机会学习艰深汉字汉文的平民百姓以极大便利。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事大慕华思想具有绝对权威地位，故尔后数百年间，训民正音仍被视为没有文化的庶民阶级专用的俚俗文字，官方通行的仍是汉文汉字。但是，这种新文字的创制，为以表达个人情感为特征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朝鲜文人们不仅用它记录整理口传民歌，还用它创作时调，并又创造出新的长歌形式歌辞，尽情抒发胸中感情。接着，又出现了用训民正音创作的纪事文学、小说、杂歌、说唱文学等等。于是，朝鲜国文文学进入发展期。

近代历史开始以后，中国在同东渐的西方势力对抗中屡屡败北，朝鲜人头脑里的“天朝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始动摇。甲午一战，中国战败退出朝鲜，中朝宗藩关系结束，朝鲜落入日本控制之下，1910年朝鲜终于被日本吞并亡国。

在反对日本侵略和尔后的复国斗争中，朝鲜民族精神空前勃发。由朝鲜人自己创制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成为民族独立精神的寄托和象征，提倡和使用训民正音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含意。这样，一是拼音文字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二是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推动，训民正音在本世纪初取代汉文成为朝鲜社会主流文字，20年代以后便很少有人用汉文进行撰述，朝鲜汉文文学的历史结束了。由于通行的朝鲜语中有大量词汇来自汉语，为了便于理解，人们在书写时仍用汉字标示这些词汇，固有词汇和助词之类则用拼音文字，于是便形成了至今韩国仍广泛流行的汉字和拼音文字混合使用的文字现象。用这种汉韩合璧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当然属于国文文学范畴。

二战后朝鲜分裂。北方1949年进行文字改革，完全废除汉字，书写和印刷品中一律使用拼音文字。

写到这里时，译者作为一名朝鲜文读者应该顺便谈谈自己阅读时的一点感悟。汉字作为一种象形表音文字，当把它完全变成没有意义的拼音符号时，至少会遇到两种困难：一是遇到不常用的词语或发音相似相同的词语时，人们就不知其所云。正因如此，韩国报刊经常是在拼音文字之后再 用括号中的汉字注明之。

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后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这种文字由于没有词根、词素等构成而完全失去造词能力，文字再也不能丰富发展。除非是生吞活剥地大量引进外来语，此外别无他法。对此，不知我国热心于汉字拉丁化的人想到没有。我怀疑，拉丁化的“汉字”能否具有负载中国文化的功能。至少，纵使有天大的本领用拼音文字也写不出唐诗宋词来。莎士比亚是用拼音文字写作的，但他创造的是英国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在朝鲜历史上，汉文文学和国文文学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际遇和荣枯，尽管表面看起来它们之间有着此盈彼缩的对应波型，但我还是相信它们同作为朝鲜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而不是相克相消、此生彼亡的关系。

因此，论及汉文文学在经历历史的辉煌之后式微，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退出朝鲜文坛的原因时，本书作者赵润济先生本着“国文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国文文学同汉文文学斗争史”的思路（见本书第十二章），认为是国学精神复苏的结果，我则认为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因为，即使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之间，也不仅仅是只有冲突没有相互吸纳融和共同发展（对此，近年来，我国学界在批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已阐述得非常明白），何况是同为朝鲜民族情感表现，仅仅是用两种不同文字创作的文学呢。应该说，两种文字的文学相互促进才是朝鲜文学史的主流。其实恰恰是在同一时期，在汉字汉文的发祥地中国也发生了一场以白话文取代言文文的革命。中国和朝鲜同时发生的这种文字革命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它表明这种变革后边有着更为根本性的原因。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由于社

会财富高度集中，有闲阶级有充足的财力和闲暇对文学艺术进行雕琢把玩，促使文化向着精神享受和实际应用两个方向分化，再加上古时书写条件的困难，人们只能把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用最简洁的文字写或刻出来，于是便产生了优美而洗炼的文言文。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被从少数人那里解放出来，一般民众也开始享用之，加上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书写印刷技术的发展，人们需要而且也有条件做到牺牲文章的简洁优美而使之浅近平白，以接近百姓，于是便出现了白话文。形象地说，古代是书生们坐在书斋里咀嚼品味文章，现代是百姓站在街头浏览报纸。文言文和白话文各自适应自己的时代，并且各自为它们的时代提供了最佳服务。它们的进退更迭是社会本身变迁使然，不是它们之间的优劣较量。音乐厅里的交响乐听众减少，并不是街头大秧歌挑战的结果。我想，朝鲜汉文文学和国文文学的荣枯变迁大概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类似的原因吧。

本书作者赵润济先生是韩国学界巨擘，是韩国国文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 1902 年生于庆尚道醴泉，1929 年毕业于庆成帝国大学，攻朝鲜语言文学，此后以研究朝鲜文学为自己毕生事业，1978 年逝世于汉城。他 1930 年开始发表朝鲜国文文学研究成果时，正是统治朝鲜的日本肆行推进同化政策的时候。他们禁止学校教授朝鲜语和朝鲜历史，鼓吹“皇国臣民化”。当时朝鲜爱国学者便以努力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进行对抗，捍卫民族尊严和传统。赵先生的国文文学研究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并取得杰出成就。30、40 年代，他先后完成《韩国诗歌史纲》、《国文文学概说》、《国文文学史》、《春香传校注》等著作。现在我们用中文翻译出版的这本《韩国文学史》是他经过近 20 年的苦心钻研、精心构筑的成果。本书 1948

年初版，1963年修订再版，我们据以翻译的原本是1992年的第五版。正如作者在再版序文中所说，当初他是把国文文学史当作民族独立运动之一环进行研究的，该书完成时又恰逢半岛南北两部分正着手筹建各自的政府、国家分裂固定化已成事实的悲愤时刻。因此，这部书从立论到谋篇甚至使用的某些语言都有着较强的时代印迹。但是，它在韩国国文文学史研究中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它所构筑的学术体系在学术界是公认的。因此我们极乐意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关心朝鲜文学史的朋友们。

译者是一位国际政治学者，所研究的方向之一便是朝鲜问题。除去关注朝鲜半岛的政治结构和围绕半岛展开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外，对半岛的历史、文化等也颇有兴趣，有时也翻译些文学作品。但是，迄今为止，在我的翻译工作中花费时日最多的应该算是这本《韩国文学史》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篇幅较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书里引用了大量的朝鲜古代和近现代作家们的时调、歌辞、自由诗等，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一代名篇。我们知道，诗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它的生命是同它借以诞生的那种文字熔铸在一起的。诗要告诉你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通过某一种文字所特有的韵味向你渲染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和意境，唤起心与心的共鸣。一旦把它同它依着的载体剥离，它借以安身立命的许多东西便荡然无存。越是好诗，这种熔铸就越难以分离置换。因此，书中的每一首作品都必须花大量心力去揣摩体味，尝试着用中文去转换表达。而且，其中许多作品是用古代拼音文字写成的，与现行文字大不相同，这就更增加了读懂读通的难度。因此，有许多次我不得不停下笔去请教我国著名的朝鲜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的朴忠禄教授。在这里，我向朴教授致以诚挚感谢。

最后，这里还必须谈一谈无论是原书中还是这篇译者前言中一再使用的半岛称谓问题。因为在半岛处于分裂状态下，南北各有一套系列称谓指称国家和民族。例如，北方所称的朝鲜、朝鲜民族、朝鲜文学、朝鲜半岛、共和国北半部、南朝鲜等等，在南方则称为韩国、韩民族、韩国文学、韩半岛、北韩、南韩等等。因为这里隐伏着国家继承权之争，因此采用何种称谓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朝鲜”一词得之于中国古籍，很可能是传说中朝鲜民族始祖檀君建国之地“阿斯达”的意译，意为“日出之地”。汉四郡设立以前朝鲜被统称为古朝鲜；三国时代及统一新罗时期各以其国号称其国家；高丽王朝统一半岛后中国史书即称之为高丽，当今西方各国对半岛的称谓即源于此。李氏王朝取代高丽后定国号为朝鲜，于是国家亦得此称谓。中朝宗藩关系结束后高宗国王曾宣布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这里的“韩”可能是取承继三韩之意，旨在强调独立，实际上此时朝鲜已为日本控制。朝鲜亡国后兴起各种派别的独立复国运动，不知为什么一般左翼都在自己的名号前冠以“朝鲜”，右翼则多选用“韩国”，如：“朝鲜共产党”、“大韩独立同盟”等。日本败亡后，三八线两侧分别建立起以右翼或左翼为主体的临时统治机构。这样1948年南北分别建国时，各以“大韩民国”（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为国号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双方都坚持自己是国家法统的继承者，于是便产生了相互对立的称谓体系。

韩国学者赵润济先生将自己的这部著作定名为《韩国文学史》即由此而来。但在韩国也有的学者依从历史习惯以“朝鲜”指代整个国家和民族，如韩国学界泰斗李家源先生将自己1995年出版的一部大作定名为《朝鲜文学史》。显然，这里的“朝鲜”

是指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是仅仅指李氏王朝，更与国家分裂以后的情况无涉。

所以，译者在这里应该说明，本书译文中出现的这类称谓是遵照原文译出的，译者所加的注脚和译者前言中出现的有关称谓完全是一种习惯用法，没有任何特别意义。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韩国大山财团的支援，特表感谢。

张璉瑰

于京西大有庄 100 号

1997 年 3 月 28 日

序

这本书初版至今已过去 15 个年头。此间世事沧桑，我自己也多有变化，故而国文文学史不可能依然旧貌。

具体地说，在这段时间里又发现不少新的史料，随之我的学术观点也有发展。按道理讲，这本书早就应该修订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一本书不断修订重版，虽然是一件令人心慰的事，但也难免有作者急于推脱著书立说社会责任之嫌。因此，即使是本人对这本书颇有不满意之处，但我还是忍耐了 15 年。

15 年，这不是一个短时间。在忍耐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也不能漠然处之了。于是，我着手对旧稿进行修改，这样便有了现在这个修订版。与初版相比较，修订版最大的变动是将中古文学中的萎缩时期细分为两部分，一为式微期，一为潜动期。此外把现代文学独立成篇，较初版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叙述。

现代文学部分在初版时本不想写得过于详备具体，但距初版已过去 15 年，如今对这段文学历程不能不予以关注了。于是，我只好花些笔墨。但是，这些工作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史料作些整理，尚算不上是写史。

回想当初，我是把国文文学史当作民族独立运动之一环进行研究的。解放后，我们民族不意遭人分裂，我一时一刻也不敢忘